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 疑古与走出疑古之争 / 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的评论 \(2\)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第四章第二节 \(2\)](#)

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的评论 (2)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第四章第二节 (2)

2004-10-24 吴少珉 赵金昭 等 旧版文章 点击: 1267

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的评论 (2)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第四章第二节 (2)

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的评论 (2)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第四章第二节 (2)

作者: [吴少珉](#) [赵金昭](#) 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2-2 23:08:40发布) 阅读340次

(五) 关于《鹑冠子》、《六韬》的真伪问题

《鹑冠子》是一部先秦道家哲学论著，内容纷繁多样：谈论政治、历史和哲学，设计理想政府，对君主如何统治，如何选贤与能，贤人的出处，人民的生活及生活的安宁和平等，都有所论述，十分庞杂。《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一篇，作者为“楚人，居深山，以鹑为冠。”《隋书·经籍志》却有三卷本传世。柳宗元注意到《世兵》篇的不少文句实际上与贾谊的《服鸟赋》相同或相似，他在《辩鹑冠子》一文中，谓其“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服赋以文饰之”。司马迁不称《鹑冠子》，因而推断其必有部分为汉以后的伪作。[46]清人沈钦韩、王闿运沿袭此说，长期以来《鹑冠子》被视为伪书，备受冷遇。钱穆也怀疑该书，他说：“今其书所传既不足信，秦汉间又少知有鹑冠子其人，则此一卷书者，纵在，固无大观，姑置勿论可尔。”[47]但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卷前佚书《黄帝书》中，亦有不少与《鹑冠子》相同或相似的语句，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判断哪部文献取自哪部，诸多文句的相似至少说明，如果《鹑冠子》的原文本西汉时尚未存在，那么《鹑冠子》中的某些材料，西汉就已经存在，或至少说明《鹑冠子》的著作年代不会晚于秦代。

《鹑冠子·王鈇篇》中有称县邑之长为嗇夫，而在汉代，县令、长已经不再称嗇夫了，说明《鹑冠子》不会是汉以后作品。李学勤考察了《鹑冠子》一书的篇数、作者及学派归属，认为“《鹑冠子》的年代比较清楚，它的上、下限连二十年都没有。因为很明显的是，庞煖死的年代是已知的，书中称他作‘庞子’，是庞煖学生的口吻，另外有些地方还避秦始皇的讳，可见一定也经过秦代。仔细考虑，这部书的时代不出战国的最后几年到秦代的焚书以前。”[48]黄怀信也通过对《鹑冠子》的作者、版本、卷数作了仔细考察后，认为“今本《鹑冠子》文字的最终撰作年代，当在公元前236至228年之间，可见其确是一部先秦文献。”[49]孙福喜则通过对《鹑冠子》一书的内容及与其相关的文献资料的爬梳、分析、考辨，认为“《鹑冠子》一书是由鹑冠子为给赵国统治者出谋划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九道’为学术纲领，成书于公元前236至前221年之间的，与《吕氏春秋》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的思想理论特点的黄老道家学派的著作。”[50]如果不发现帛书《黄帝书》，那么《鹑冠子》就要冤沉海底了。

《六韬》是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为周代吕望（姜太公）所著，现存六篇，被列入《五经七书》之一，《汉书·艺文志》不载，但在“道家”类著录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又有“《周史六弢》六篇”，注曰：“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认为该书“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南宋叶适判其为伪书，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称：“然世俗流传，而兵家窃借以为书，若今《六韬》者，后世承谬，谓其君臣遇合之间，阴譎狭隘至此，则何以‘对越在天’而‘上帝临汝’乎？”[51]明清以来，学者群起而应之，认为是魏晋以后假托太公之名的伪作。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说《六韬》“其辞俚鄙，伪托何疑！”[52]梁启超也说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53]，《六韬》伪书一案，遂成定讞。

其实在先秦至三国古籍中，屡次提到《六韬》。如《庄子·徐无鬼》有“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版》、《六弢》。”《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刘备遗诏：“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可见历代都有人诵读、利用《六韬》。而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发掘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儒家者言》、《文子》、《论语》、《六韬》等汉代佚籍。根据汉简的简型、内容和字体等被确认为《六韬》的竹简共有144枚，上有许多有文王、武王问，太公曰的字样，与今本《六韬》内容相同或近似，进一步证实了《六韬》决非伪书。

简本《六韬》内容均是讲政治谋略的，而不讲兵法，传世本中专论兵法的各章则不见于简本。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一些文句有一定的出入，有的附加衍文，有的经过窜改，有的还有错漏等。一部古籍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有衍文、有遗漏等，都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认为其为伪书。并且汉时流行避讳，而简文中有汉文帝“恒”字，不避帝王讳，“说明《六韬》一书，可能成书的时代早于汉。一种思想的形成并转化为一部书，不可能是一时之功，所以《六韬》的形成应该说早于秦汉之际。”[54]定州汉简《六韬》的出土，不仅纠正了《六韬》伪书说，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六）对《孔子家语》的新看法

《孔子家语》基本上是一部以孔子为中心的古传说汇集，与《礼记》中的某些材料相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七卷”，颜师古表示怀疑，注云：“非今所有《家语》”。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家语》四十四篇，虽孔安国撰次，按后序，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名曰《孔子家语》。”又说：“《家语》汉初已流布人间，又经孔安国撰定。”[55]但后代学者对其真伪却产生了怀疑，认为是王肃的伪作。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却非肃所作。”指出王肃有所依傍，并非凭空伪作。到了清代中叶，孙志祖作《家语疏证》，范家相作《家语证伪》，逐篇逐章寻出作伪依据，并指出其割裂改窜的痕迹，似乎《孔子家语》是伪书这一桩公案就此判定了。顾颉刚对清人王柏所言“今之《家语》……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十分赞同，认为“绝对正确”，并说：“故今之《家语》，大部分为编辑，小部分是创作。”[56]又说：“《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书。”[57]实际的情况是，王肃获得了一个早期的本子，然后为了迎合他与对手的论辩，加入了自己的阐释。即便如此，《孔子家语》的编纂要追溯到更古老的传统。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竹简6000余枚，内容有《诗经》、《苍颉篇》等佚籍，都是现存最早的古本，同时出土的木牍文书中，许多语句在今本《孔子家语》中可以见到。李学勤据此认为：“早在汉初确已有《家语》的原型，《史记》世家、列传很可能参考过此书。刘向编集《说苑》，也收录了其中文字。王肃作解的今本《家语》，大约就是在简本的基础上经过几次扩充编纂形成的。”[58]胡平生也根据阜阳汉墓木牍和《说苑》简的材料讨论了《家语》的真伪及成书年代，结论为：（1）从汉初就流传着一批记录孔子及门弟子言行和诸国故事的简书，这批简书应当就是后来编纂《孔子家语》、《说苑》、《新序》等书的基本素材。（2）从汉文帝时汝阴侯墓简牍所见专记孔子言行的篇章，可以看到汉初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家语》的编纂，正是儒术发达以及孔子受到重视的产物，旧说孔安国编纂《家语》并作序，应当是可信的。（3）长期以来，今本《家语》被认为是王肃伪作，细审各家所举“罪证”，按现在所知道的古籍编纂与整理的知识加以考察，证据并不充分。关于《家语》在流传过程中，有亡佚、改易、增益等各种情形，皆属传世古籍所遭遇的普遍问题，不能据此论定其为伪书。[59]这样就澄清了过去以为《孔子家语》是王肃作伪的说法，对于研究西汉初年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阜阳双古堆和定县八角廊汉简与今本比较，一简一繁，说明今本在竹简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广补辑，这是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常有的现象。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增广补辑部分将其视为伪作，也就是说，不能因其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否定《孔子家语》一书本身的价值。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买了一批战国楚竹书，其中《孔子诗论》中有孔子对《诗·召南·甘棠》的解说，将之与《孔子家语》相比较，两者基本接近，因此朱渊清确信：“《孔子诗论》是孔门弟子所记孔子《诗》说，《孔子家语》则很可能就是在《孔子诗论》之类原始本子的基础上钞撮编成。”[60]

(七) 对《晏子春秋》的再认识

《晏子春秋》是记录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言行的一部著作。最早记载该书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他在《管晏列传》中云：“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晏子》八篇”，列在儒家类，并自注云：“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皆称《晏子春秋》，只是卷数不同而已。

关于《晏子春秋》一书的真伪及作者问题，过去众说纷纭。柳宗元首先从学派所属问题上提出质疑，他说：“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后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61]但他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书的真伪、作者、成书年代及学派归属等问题展开辩论。孙星衍即认为非伪书，他说：“（《晏子》）实是刘向校本，非伪书也。……疑其文出于齐之《春秋》，即《墨子·明鬼篇》所引。婴死，其宾客哀之，从国史刺取其行事成书。虽无年月，尚仍旧名，虞卿、陆贾等袭其号。《晏子》书成在战国之世，凡称子书，多非自著，无足怪者。”[62]但对作者有晏婴自撰、墨子之徒有齐人者所为、淳于越一类人所撰、与稷下大夫有关等不同观点。成书年代也有六朝、汉初、秦统一六国之后、战国时代等多种说法。梁启超说：“柳宗元谓晏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盖近是。然其人非能知墨子者，且其依托年代似甚晚，或不在战国而在汉初也。今传之本，是否为（司马）迁、（刘）安所尝读者，盖未可知。然似是刘向所校正之本，非东汉后人窜乱附益也。其书掇摭成篇，虽先秦遗文间藉以保存，然无宗旨，无系统。”[63]高亨则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稷下大夫，但是“《晏子》经过秦火的摧残，是刘向所校编，后人又辗转抄写，其中杂有后人增添的语句甚至章节，乃属应有的现象。《史记》还有许多篇有后人附加成分，而况《晏子》！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索，严肃地加以审辨，可是决不能因为有后人增添之处，从而拉下它的写作时代，完全书为伪作”[64]。一时间难以定夺。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大批竹书，其中有《晏子春秋》16章，此外，1973年，河北定县系汉墓中也发现《晏子春秋》残文，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了一些

《晏子春秋》残文，1972—1974年，在甘肃居延发现一枚《晏子》木简，仅存48字。这四处出土的竹简，时代最早者为阜阳双古堆，为西汉文帝时墓葬。数量最多，也较为完整的是银雀山汉简《晏子春秋》，在章节的分合及文字上与今本有不少差异。简本不但可以纠正今本的一些字句讹误，而且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后人窜入的一些文字。如《内篇问上·景公问伐鲁晏子对以不若修政以待其乱第三》章“今君好酒而辟，德无以安国，厚籍敛，意使令，无以和民”句，过去不少人认为句法不通，难以诠释。简本作“今君好酒而养辟（嬖），德无以安国，厚籍敛，急使令，正（政）无以和民”，文通义顺，其疑自解。类似例证，枚不胜数。

简本《晏子春秋》的出土，为我们重新认识该书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说明过去认为成书于六朝说不攻自破，而古书从成书到得以流传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汉初及秦统一六国之后说也不可能。骈宇騫据此作了推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或士大夫中就有不少关于晏婴的传说，到晏婴死后，有些人便收集这些传说，并逐渐著之于竹帛，秦汉时已经有不同源流的《晏子》“版本”，书中保存了不少齐国方言，一些地名与史实也史书所记齐国吻合，所以“很可能是官处齐地的一些士大夫根据这些传说或史书记载编写而成”。[65]先秦多数古籍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某一学派著作的汇编，每一种书的形成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和编纂过程，最后才写为定本。这与余嘉锡所总结的规律相吻合：“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既是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论政之文，则藏之于故府；论学之文，则为学者所传录。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66]

(八)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订正史书记载的讹误

战国为我国文化史上极重要时代，而史料最缺乏。传统研究战国史的资料有刘向按国别编录的《战国策》，记载的多是纵横家言，语涉虚诞，许多篇章为后人所造说，还有一些是说客的假设比拟，不完全是历史事实，可谓真伪参半。而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战国历史的叙述，多依据秦国史官记录的《秦记》，记载各国君臣、卿大夫世系的《牒记》以及诸子书，间或采录一些如《短长》、《国策》之类的所谓“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

[67]这些说辞多属夸张扩大，甚至是假托虚构之作，年代和史事相当紊乱。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一部主要记载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等人书信、说辞的古佚书，题为《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17000多字，其中11章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致相同，文字稍有出入。另外16章则是古佚书，内容十分丰富，为我们提供了原始的苏秦资料，纠正了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错误，对于认识战国中后期政治局势的变化，帮助极大。依据帛书内容，唐兰考证编订出《苏秦事迹简表》，订苏秦活动时间为公元前312—284年；杨宽也据帛书改写了《战国史》，他说：“今本《战国策》中所载张仪、苏秦游说的史料，真伪参半。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其中第一部分提供了苏秦为燕反间和发动合纵攻秦的可信史料，我们可以据此鉴别《史记》和《战国策》中所有苏秦史料的真伪。”又说“近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更明确地可以证明《史记·苏秦列传》所载长篇游说辞出于后人伪造，《战国策》中所有苏秦的史料也是真伪参半。”[68]

战国中后期，齐、秦两大国东西对峙，楚、宋、燕、三晋（赵、魏、韩）南北其中，出现了合纵连横的错综复杂局面。那些出谋划策的游说之士即纵横家，周游列国之间，留下了不少游说君王的书信和说辞，并汇编成册，成为当时的一门显学，苏秦、张仪就是纵横家中最突出的二位。史书均把苏、张二人并称，认为是活动于同一时代、东西两大阵营（合纵、连横）的对手。《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曾游说燕、齐、楚、三晋合纵对抗秦国，被举为从约长，身佩六国相印，“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后死于齐国，约在燕王哙时（公元前320—311年）。但是，《战国纵横家书》中有关苏秦的言行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反映了公元前288年前后苏秦为燕王到齐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经过，特别是在燕昭王破齐这一重大事件中，苏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从下面一段话中可以看出：

自齐献书于燕王曰：燕齐之恶也久矣。臣处于燕齐之交，固知必将不信。臣之计曰：齐必为燕大患。臣循用于齐，大者可以使齐毋谋燕，次可以恶齐勺（赵）之交，以便王之大，是王之所以与臣期也。臣受教任齐交五年，齐兵数出，未尝谋燕。齐勺（赵）之交，壹美壹恶，壹合壹离。燕非与齐谋勺（赵），则与赵谋齐。齐之信燕也，虚北地口（行）其甲。王信田代（伐）縲去（疾）之言功（攻）齐，使齐大戒而不信燕。[69]

公元前314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酿成内乱，齐宣王乘机大举攻燕。燕王哙与子之俱死，燕几乎亡国。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力图报仇，于是招纳人才，等待时机。苏秦就是在此时来到燕国，并受到信任。公元前301年，齐闵王立，国势稍衰，苏秦向燕昭王提出谋齐策略，并亲赴齐国行使反间计划，尽力搞好两国关系，使齐不谋燕伐燕。若按《史记》所载，此时苏秦已死，司马迁便在《田敬仲完世家》中把行使反间之人系于苏秦之弟苏代。而帛书资料却显示，苏秦才是这幕历史剧的主角。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领五国联军讨伐齐国。齐国大败，一度面临灭亡的境地。苏秦的燕国间谍的真面目也就完全暴露了，于是被齐王车裂处死。而《史记》把苏秦说成与张仪同时代的人物，死在张仪之前，事实上，苏秦的年辈要比张仪晚25年左右，其活动年代当在齐闵王统治时期。由于这一缘故，那些本来属于苏秦的真实事迹和史料，反被加到了其弟苏代、苏厉的身上，造成苏氏兄弟史实的混乱不清，进而影响了《战国策》中有关苏秦史料的真实性。司马迁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70]赖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对苏秦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的历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当时，齐、秦作为东西两大国，几乎势均力敌。由于苏秦的反间活动成功，乐毅伐齐大胜，齐国由此削弱。客观上为秦统一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段历史是战国后期的关键之一。帛书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事实作了澄清，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

（九）银雀山汉简与马陵之战

齐魏马陵之战（公元前340年）是战国时期的一场重要战役，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有关文献史籍的记载比较复杂、零乱，甚至多有矛盾、抵牾之处。《史记》《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孟尝君列传》和《六国年表》均说杀庞涓，虏太子申。而《孙子吴起列传》记魏国统帅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颈，曰：‘遂成竖子之名！’”结果魏军主力被全歼，太子申被俘，庞涓自杀。《战国策·魏策》也说：“齐魏马陵之战，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其十万之军。”《齐策》又说：“田忌为齐将，系太子申，禽庞涓。”两书记载各不相同，因此有人怀疑马陵之战与桂陵之战实为一次战役。因为庞涓在桂陵之战中已经被俘，不可能再在马陵之战中充当魏军主将了。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臆兵法》中有《擒庞涓》一篇，详细叙述了马陵之战前的

桂陵之战（公元前353年），“昔者，梁君将攻邯郸，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荏丘。齐君闻之，使将军忌子、带甲八万至……竞。”孙臆采用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等办法，在桂陵大破魏军，俘获庞涓，“庞子果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尽矣”。这里“擒”字不仅有俘虏、捉获的含义，而且有制服之义。《陈忌问垒》篇也记载了孙臆对答田忌，谈论了他临时设置障碍，调配各种兵力的战略战术，“所以应猝窘处临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口（涓）而擒太子申也。”[71]“取庞涓而擒太子申”，当指马陵之战。

《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18年（公元前353年）齐魏桂陵之战，没有提到庞涓，后13年马陵之战时，庞涓被杀，太子申被虏。简文记庞涓在桂陵之战中被擒，为什么到十余年后马陵之战才被杀呢？可能的解释是：庞涓在桂陵之战中既没有被杀或自杀，也没有被俘，而是在战败（被制服）后与太子申去赵国当了人质；退一步讲，庞涓即使在桂陵之战中的确被俘，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被杀，实际上被释放的可能也是存在的。或许他又被放回魏国，再度为将。如同春秋时秦晋殽之战中，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为晋军所俘，旋又释放，仍为秦将一样。

由此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书中确有不少伪书，还有许多书中有后人窜入的篇章或段落和个别文字，但不能据此认为该书全伪。因为古籍在流传之初，往往没有固定的形式，大部分都随写随传，单篇或者数篇先行，而且也不署名，后来才由门生或弟子汇集成书，或多次汇集成书。因此，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往往都成于众人之手，经过多人的抄写、汇集、编注及传播的复杂过程，段落可增可减，篇幅可长可短。也就是说，当古代纸和印刷尚未发明的时候，著作只能手抄在笨重的竹简或易坏的帛书上流传，有时甚至没有书写下来，只是在师生之间凭记忆口传，经过多年传习，一种书的字句以至章节篇数，都难免更改修订。这就要求我们在讨论古书真伪时，要坚持冷静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不能以偏盖全。尹达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他说：“古书的真伪问题，在这里也应当加以分析：大约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个别的史学家为了探求真正的中国古史，将一些古书加以批判，找出了一些后代伪称为前于那一时代的古书；因此他们把许多所谓‘伪书’里的史料一笔抹煞，不去采用了。这样严谨的态度固然很好；但是缩小了史料的范围，只局限于少数古籍之中，会使中国原始社会的研究遇到更大的困难。书籍写成的年代，我们有了正确的估计，然后才能够正确地理解传说的本质。……我以为即令是后代伪照的古籍或者经过后代删改的古籍，它里面还是会保存着不少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史料；只要我们能够依据着考古学上所提供的骨干，参之以世界原始社会的具体内容，审慎地探求一些可靠的史料，还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事。”[72]

近30年来，随着文物古籍等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出土，如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张家山汉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珍本秘籍”的相继问世，在与传本对照后，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大凡比较受重视的书在流传过程中变化较小，不太受重视的书变化就大一些。例如简本《孙子》和两种帛书本《老子》和今本大体相同。而简本《尉繚子》、《六韬》和今本的距离就大得多。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古史辨伪的成果作客观的检验，学术界对古史辨派疑古过勇的流弊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有学者指出：“以前很多人认为今本《尉繚子》和《六韬》跟《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尉繚子》和《太公》无关，都不是先秦古籍。今本《晏子》也有人怀疑不是先秦的书。银雀山竹书的发现，证明这些看法是不对的。尽管今本《尉繚子》和《六韬》在编排上与《艺文志》所记不同，文字亦与简本有很大出入，但是它们和以银雀山简本为代表的西汉古本的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古代，一种著作从开始出现到广泛流传，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这两部书既然在西汉前期已经流传开来，其写成年代大概不会晚于战国。今本《晏子》文字与简本基本上相同，其为战国古籍，尤无可疑。”[73]

随着辨伪方法的进步，有学者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及其写作年代，因为作伪者的思想活动不能不以当日的语言为基础，不能摆脱他所处时代语言的影响。杨伯峻考察了《列子》一书中：①“数十年来”这一说法与先秦、两汉的说法皆不合，却与《世说新语》某一说法相合；②“舞”字两种用法，一种与两汉人用法相同，一种甚至出现于西汉以后；③“都”字作为副词，只是魏晋六朝的常用词；④“所以”作为连词，绝不是先秦“所以”用法，而只是东汉以后的用法；⑤“不如”一语的使用也只是汉朝才用的。由此可见，《列子》虽托名为先秦古籍，却出现了不少汉以后的词汇，甚至是魏晋以后的词汇，这是其为伪书的铁证。[74]郑良树也总结了四个趋势：（一）在态度上渐趋平实；（二）在方法上渐趋严密；（三）在论断上渐趋谨慎；（四）在论证上渐趋周备。[75]特别是考古发现的竹简帛书资料，对考辨古书的真伪、订正史实的讹误，解决历史上悬而未绝的疑案，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上述大量考古新发现的简帛佚籍，对于我们重新辨别《周礼》、《左传》、《老子》、《孙子兵法》、《孙臆兵法》、《文子》、《鶡冠子》、《六韬》、《孔子家语》、《战国策》等书的真伪，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得以进行评论的第一手材料。

但是，我们在纠正古史辨派疑古过勇的同时，也不应矫枉过正，利用出土简牍和帛书文献资料考订典籍或史实，必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能夸大其辞，注意防止“趋同”和“立异”两种倾向。前者主要指将简帛古书和传世古书中意义本不相同之处说成相同，后者主要指将简帛古书和传世古书中彼此对应的、意义相同或很相近的字说成意义不同。尤其对历史上曾被疑为伪书的作品，如《列子》、伪古文《尚书》等，还是应当“考而后信”，不能根据简帛资料的只言片语来为其翻案，重蹈盲目信古的覆辙。裘锡圭指出：“疑古派以及其他做过古书辨伪的古今学者，确实‘对古书搞了不少冤假错案’。不过他们也确实在古书辨伪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有不少正确的、有价值的见解。真正的冤案当然要平反，然而决不能借平反之风，把判对的案子也一概否定。对古书辨伪的已有成果，我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决不能置之不理或轻易加以否定。……我们走出疑古时代，是为了在学术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千万不要走回到轻率信古的老路上去。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包括古书辨伪在内的古典学各方面的已有成果，从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继续前进。只有这样做，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才能正常地顺利地进行下去。” [76]

注释：

[46] 柳宗元：《辩鹞冠子》，见《柳河东集》，第73页。

[47]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4页。

[48]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见《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49] 黄怀信：《〈鹞冠子〉源流诸问题》，见《文献》2001年第4期，第39页。

[50] 孙福喜：《〈鹞冠子〉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

[51]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83页。

[52]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见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95页。

[5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

[5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的整理及其意义》，见《文物》2001年第5期。

[55]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1—232页。

[56] 顾颉刚：《王柏〈家语考〉》，见《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

[57] 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在造伪与辨伪》，见王煦华编选《古史辨伪与现代史学·顾颉刚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58] 李学勤：《简帛与汉初学术史》，见《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59] 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见《国学研究》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3—544页。

[60] 朱渊清：《从孔子论〈甘棠〉看孔门〈诗〉传》，见《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61] 柳宗元：《辩晏子春秋》，见《柳河东集》，第70—71页。

[62] 转引自骈宇騫：《银雀山竹简〈晏子春秋〉校释》，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223—224页。

[63] 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转引自骈宇騫：《银雀山竹简〈晏子春秋〉校释》，第227页。

[64] 高亨：《晏子春秋的写作年代》，见《文史述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7页。

[65] 骈宇騫：《对〈晏子春秋〉的再认识——兼论古书的产生与流传》，见《中华同人学术论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4页。

[66] 余嘉锡：《古书通例·论编次第三》，见《余嘉锡说文献学》，第238页。

[67] 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

[68]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69] 《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9页。

[70]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71] 《孙臆兵法》，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31—32、49页。

[72] 尹达：《中国原始社会》，见《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73]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编辑说明》（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74] 杨伯峻：《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见《杨伯峻学术论文集》，第143—163页。

[75] 郑良树：《论古籍辨伪学的新趋势》，见《续伪书通考》，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9—49页。

[76] 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见《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第12—14页。

出处：《二十世纪疑古思潮》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